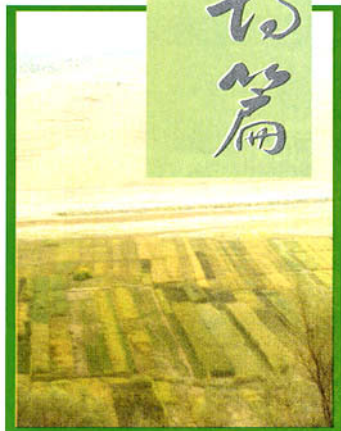


城上的诗篇



■文/陈嘉桢 李雄梧 陈四长
■图/陈宝生 曹英琦

陕北的榆林有两条长城。

一条从两千年前走来，在榆林东起府谷黄甫川，西接定边花马池，全长700多公里。榆林人把长城叫边墙。但边墙的坚固，并没能阻挡住历代兵戈的南下和风沙的南侵，它一次又一次地湮没于战火和风沙的尘埃之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只是明代长城的一段。

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今日榆林北部，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为世人瞩目的新长城。这长城由北缘、长城、环山、灵榆四条大型防风固沙林带构成，全长1500公里（计造林面积175万亩）。秀美壮观的绿色长城，锁住了肆虐狂暴的沙龙。榆林的生态环境，再也不是唐朝诗人李益笔下的那种“有日天长惨，无风沙自惊”，而是人进沙退，林网纵横，绿洲星布，换了人间。

站在雄伟的绿色长城下，回首沙漠里废圯的古长城，我们心里涌起万千感慨！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这真是一个

了不起的历史性变化！

从全球范围看，土地荒漠化仍是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荒漠化仍以每年5万至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的态势下，这里的沙漠却以每年1.62%的荒漠化逆转速率在缩小。这不能不令世界为之惊叹！

创造这一奇迹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业绩，无疑是应该写在绿色长城上的。

毛乌素沧桑

毛乌素沙漠横贯内蒙古、陕西两省交界。伸展到榆林北部的这片面积为2.44万平方公里，占榆林市总面积的56.7%，沙区波及府谷、神木、榆阳、佳县、横山、靖边、定边一区六县的93个乡镇、110万人。

对于毛乌素沙漠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毛乌素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除了大漠的浩瀚和民风的醇厚，更多的是荒凉和贫困。20年后，

当我们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喊出:“榆林大变了!”当年的许多不毛之地,童话般地出现了新兴的街市;人迹罕至的沙漠碱滩,铺上了连天的绿色。纵横交错的护田林网,阡陌相连的稻田麦地,如网的灌渠,绿树掩映中的村舍,织出的是一幅秀丽江南的图画。汽车在沙漠绿海中穿行,人进沙退的奇迹随处可见。靖边县五台山的万亩林,榆阳区卧云山的大扁杏基地,横山县无定河畔的3万亩水田,神木县大柳塔矿区的园林式绿化……一个个生机勃勃,纷至沓来,令我们目不暇接。

市林业局负责同志告诉我们,经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的快速发展,目前,一个涵盖全市的防护林体系已经形成。到2000年底,沙区林草保存面积达到1190万亩,植被覆盖率由建国时的1.8%上升为32.5%。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不少绝迹多年的鸟类和野生动物又在沙区重新出现。与上个世纪50年代相比,沙丘平均高度降低30%~50%,沙丘年移速度从5~7米降为0~1.68米,年沙暴日由66天减为24天,年向黄河的输沙量减少45.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10倍。

世界注意到榆林的这一历史性变化。美国有影响的《时代周刊》登载《向沙漠挑战》的文章,赞扬中国的榆林地区历经30多年建起的绿色屏障,是与毛乌素沙漠斗争的一个成功例证。1992年8月,“沙地开发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榆林召开,与会的日本、以色列等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观榆林治沙后赞为奇迹,认为从这里看到了荒漠化逆转的希望和前景。联合国有关组织先后派人来榆林考察。1995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迪亚洛率项目官员卡尔波马顿在考察公约执行条件时,评价榆林治沙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

这是榆林的骄傲。这一成绩,凝结了榆林人民半个世纪的坚韧不拔的奋斗,

成就了祖祖辈辈榆林受苦人的愿望和希冀。

一部水滴石穿史

榆林人民同风沙斗争的历史,实在是一部千曲百折、水滴石穿的创业史。

千百年来,生活在风沙线上的人们,饱受了风沙灾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饥荒之苦。他们怕沙、恨沙、视沙为害,以超常的坚韧同风沙进行着生存的抗争。但同时,他们又以原始的耕作方式,掠夺式的垦荒种田,破坏植被,制造着新的沙害。无穷反复地治沙与造沙,这真是一种矛盾。

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人们还不可能认识自然,当然也不能从根本上找到

治沙的办法。每次沙害过后,都是采用手刨肩挑的办法,移沙于农田之外。因其工程量巨大,一亩积沙,常需要几天劳作。

方志上留有这样的记载:

明万历三十七年,榆城积沙已与城平。地方官员命令士兵搬沙,差点引起哗变。

清乾隆五十四年,延榆绥道杨寿南,除沙奋力,肩挑车推,历尽艰苦,事倍功半。

官府移沙是为护城,农民移沙是为护田。这种原始的抗争方式虽然悲壮,但终究抵不住流沙移动的速度,最终的结局都是沙进人退,弃田摆荒。

当劳动人民还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既没有同风沙作斗争的客观

条件,也看不到同风沙作斗争的主观力量,在风沙面前,更多的只是听天由命。

当然,历史并不只是人们无所作为的记录。1916年,靖边县杨桥畔的几户农民在引芦河水漫地时,发现流水能把沙丘旋开、冲散、拉走,从中得到启发,于是集股在芦河上以柴筑坝,引水拉沙,平地造田。但辛苦所得,最终成为富绅们的圈地,加之上下游因水纠纷官司不断,引水拉沙的创举刚刚实施便夭折了。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到杨桥畔考察,具体解决了拉沙造田中的地权、资金、劳力等实际问题,加固了坝墙,拓宽了水渠,一年内增修水地1500亩。次年,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又发动农民修水地5000亩。靖边县植树造林、拉沙造田的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1943年1月,毛主席特地召见惠中权并为其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靖边于边区时代的创造,无疑是榆林地区治沙史上极其光彩的一笔。但就全区来讲,真正地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治理却是在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榆林市副市长白玉仁谈起全市的沙漠治理如数家珍。他说,建国后榆林地区的治沙,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0年到1960年为防风治沙的试验摸索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通过典型示范和国营农林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治沙工作在面上展开。1961年到1979年为集体大规模治理阶段。曾经涌现出定边县小滩子、靖边县杨桥畔、神木县窝兔采当等一批综合治理沙漠的典型。1979年以后为农户承包治理的大发展阶段。经过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大

投入,全市防治荒漠化的工作驶入了“快车道”,千亩万亩以上的个人承包造林大户竞相出现。再一个阶段就是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沙产业开发向纵深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榆林市尽力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以个人、联户投入为主,国家投入为辅,银行信贷为补充的多元投入机制,将沙区产业开发引上了一个新高度。

勾画这四个阶段,几百字就够了,但奋斗的过程决不是这么轻松。每一个阶段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都经历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

定边县有个小滩子村,这个村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可以说是全区治沙初始阶段的一个缩影。

刚解放那阵,这个村穷得只有几亩“跑沙地”,每年返种两三次还捉不住苗。当地群众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光下种,不捉苗,种一葫芦打一瓢。”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年轻的共产党员李守林不认这个命。1952年,他串联了村里28户穷苦人家,组织起一个造林互助组,想从林业上找条生路。他们背上省下的口粮,到往返40公里外的地方换回树苗,不料往沙滩上一栽全都死了。有的人因此泄气,说:“风是天上来的,沙是地里生的。干沙梁上连草都不长,还能栽活树?”李守林没有动摇,他说:“不栽树,不治沙,我们只能辈辈受穷。”他总结这次造林的失败教训,发动组里的人,用柴草一框一框地把沙地分开,先固住流沙,再搭障蔽,最后再栽上树苗,终于造出了小滩子村的第一片林。

1955年,李守林任小滩子初级农业社社长,他带领大家苦干一年,建成了

第一个护田林网。第二年一开春,又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打井突击队,在寒天冻土里打成27眼围盘井,将1500亩沙地变成水浇地。村里其余的人也不闲,忙着搞引水拉沙,一年下来,搬掉千方以上的沙丘100多个,造地1400多亩。

地平了,井也有了,但纯沙地渗透大,地质差,要实现稳产高产,不改良土壤不行。可在沙漠里找土谈何容易!最近也要从5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运。那个年代的人真不知道咋那样能吃苦。李守林和他的乡亲们大干了两个多月,运土1万多车,改造沙地70多亩。当年就产生了明显的效益,玉米亩产由改土前的95公斤提高到206公斤,粮食总产成倍增长,不仅做到了自给有余,还给国家有了贡献。

什么叫愚公移山?什么叫水滴石穿?小滩子人在改造沙漠中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奋斗就是这种精神。

尽管“精神”这个字眼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但精神的力量却是永存的。当年的榆林人民,正是靠着那股子愚公移山的精神,才在荒丘大漠中开出了一片新天地。

领导的接力事业

榆林市从建国至今,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换了多任。就沙漠治理这一点看,每一任领导都是一位合格的接力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同唱一台戏,同念一本经,一届一届往下传,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榆林采访期间,我们对此深有同感。

榆阳区(即原榆林县)的情况最能说

明这种现象。这个区的干部群众这样评价曾在他们这里工作过的几任领导:郝延寿修了两条渠(榆高渠、榆西渠);屈宽海建了一片网(农田林网);石海源治了一个沙(林草覆盖率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提高)。

尽述他们的业绩是困难的,那需要写一本大书。我们只能突出介绍他们中的几位。

石海源无疑是应该突出介绍的一个。从1981年起,他当了七年的榆林县委书记。他在任时的“一包二封三禁”的三步硬棋,对改善今日榆阳区的生态环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包”,即与各乡订立一定三年不变的治沙承包合同。合同规定,结合乡上的选举,考核造林治沙的成绩。超额完成任务的,可以奖励一级工资;家属是农村户口的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发给奖金,授予县劳动模范称号并写入县志。县上同时制定了“统一规划,分户治理,谁治归谁,允许继承”的政策,调动群众造林治沙的积极性。各乡按照这个政策再向各村,各村再向各户,逐级进行承包。

这一招还真灵!全县各级干部、各家各户的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真正形成了向沙漠进军的人民战争。从1985年到1987年的三年时间,榆林全县就治理沙漠130多万亩。

石海源的第二步棋是对远离村庄的100多万亩沙漠荒地实行全面封闭。不取一草一叶,不许一人一畜骚扰,以便让自然沙生植物在没有人为破坏的环境下尽情地繁衍儿女。实践证明,封沙这一着棋走对了。几年下来,自然草场生长得不亚于人工草场。

石海源还有一步硬棋,就是禁止柳编。在榆林的沙漠里,生长着200万亩沙柳,这种灌木容易生长,固沙性能极好。但沙柳同时还有着另一种效益,就是用它的嫩枝编织的柳筐、柳篮,由于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所以很受外国人

的喜爱。沙区群众缺钱,柳编便自然成了一项重要的副业热闹起来。任何事情一旦成风便了不得,你砍他也砍,惟恐自己落后,根本不管沙柳需要三年才能平茬一次的生长规律,结果造成了大面积的沙柳死根枯缩。如不采取措施,刚形成的一点脆弱的植被就可能被破坏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眼前的一点利益是必要的。石海源和其他领导经过权衡利弊得失,果断地作出了禁止柳编的决定。

这一着棋可不如前两着棋那么好走。因为它伤害了群众的一些眼前利益,再加上和外贸等部门发生利害冲突,所以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争论也罢,反对也罢,石海源禁编的决心都不动摇。他不是不重视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不重视资源利用,而是反对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当沙柳进入巩固的繁荣期,一味禁编自然也不可取。但眼下,榆林沙区的植被还很脆弱,重要的是保护而不是急

年承包的119万亩治沙任务,只用了两年,就超额13万亩完成了。

荒漠出现了绿色,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人看到绿油油的林啊草啊露了头,就赶着牛、羊、马进去放牧,刚出现的绿色又面临被吃掉的危险。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林草要保护,畜牧业也要发展,两者都很重要,怎样协调?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县上几套班子的人都到下边去调查。冯学富一人走了董家湾、桐条沟、古塔、余兴庄四个乡,挨村进行民意测验。80%的群众意见一致,同意野地禁牧。其他几路调查的结果,也基本是这个情况。于是,“禁止野地放牧,提倡羊只舍养”的决定便通过了。

祖祖辈辈,陕北的羊只都是在满山野滩放牧,关于拦羊的歌谣,幽婉而又古老。乍一下禁牧舍养,一些人思想通不过,嚷嚷说县上这样决定是“重林草,轻畜牧,不搞同步发展,违背中央精神”。

告状信捅到省上,捅到中央。冯学富作为第一线的执行者,压力自然很大。

压力归压力,可阵脚丝毫没乱。他们一方面向上级陈述他们在新建草场禁牧的理由,一方面积极解决羊只改舍养后一些群众暂时存在的困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省上下来批示,让他们“总结经验”。

其实,实行草场禁牧,倡导围栏饲养,并非榆林首创,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世界上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早已走上这一条科学饲养之路。冯学富算了一笔账,新建草场,不禁牧,十几亩才能养一只羊;禁牧几年,让林草旺盛起来,一亩多就能养一只羊。我们今天的禁牧,正是为了将来畜牧业的大发展创造条件。

事情的发展验证了冯学富的话。经过禁牧,土地得到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不到四载,旺盛生长的林草就产生了综合性的效益。沙区羊只存栏数也达

到28万只,基本恢复到禁牧前的水平。

……

1988年,榆林县改为县级市,2000年又改为榆阳区。机构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们治理荒漠的速度。石海源后,继任的几位县、市、区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创造了榆阳区沙漠治理的新辉煌。截至1999年底,全区570万亩荒沙,全部得到了固定和半固定,植树造林面积达到455万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35平方公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1999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4.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65元,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3.2倍和27倍。

治沙大思路

在几十年同风沙斗争的实践中,榆林市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治理沙漠的大思路。

这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对客观事物认识深化的结果,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种飞跃。

先说对沙漠的认识。一提起沙漠,寻常人总是将其与风沙、干旱、贫瘠、荒凉、没有希望等词汇联系起来,认为毛乌素沙漠是榆林发展的包袱。可榆林市的干部却不这样看。在市委领导的眼里:“榆林的贫困在沙,但优势、希望也在沙。”一者,沙区土地宽,占全市总面积的56.7%;二者,沙区地形相对较丘陵沟壑区平坦;三者,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榆林沙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且光照充足,这些都为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加工业创造了条件。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榆林市制定了自己的沙区发展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以防护林为骨架,以粮、油、肉、奶、蛋生产为主体的绿色农业新格局。

再说沙漠治理的方法和措施。这方面的系统和成熟,是以总结群众经验为先导,不断完善而走向科学的。群众是

于开发。

榆林县终于把禁编这一条执行了下来,使全县的200万亩沙柳有了几年稳定生长的时间。实践证明,这一步棋又走对了。

榆阳区需要介绍的第二个人物叫冯学富。他在榆林做了17年的副县职(从副县长、副市长到市委副书记),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老榆林了。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榆林县的造林治沙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第一个三

真正的英雄，他们在长期的与沙漠斗争的实践中，发明了引水拉沙、用水开渠、多管井、马槽井、扬风移沙、搭设障蔽、撵沙丘造林等许多好的治沙方法。这些发生于局部的探索，经过科技人员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的论证概括，推广应用，便逐步形成了以植物治沙为主，植治、水治（引水拉沙）相结合，并辅之一改（改良土壤）、三化（林网化、排灌化、园田化）、八配套（田、渠、水、林、路、电、排、技）等一整套综合治理大思路。

比如搭设障蔽，就是通过总结群众经验并不断提高丰富的。上个世纪50年

确定由漆建忠主持，进行《榆林流动沙地飞机播种造林试验》课题攻关，经过多次比较性研究，终于发现：踏郎、花棒为飞播的适宜植物种；5月中旬为飞播的最佳播期（经过对大量的气象资料分析，每年的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为西北风与东南风交替时期，其间必有一次降雨）。对流动沙丘飞播中存在的种子位移和植物被风蚀的问题，采取种子大粒化处理以及不同植物种混播等方法，增强了植物群体固沙和抗风蚀的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飞播的成活率。

实践创造着经验，实践也在不断地检验和校正经验。以前，榆林地区在植治的林草配置上，是乔灌木一齐上，以乔木为主。实践证明，这样的配置效果很不理想。经过总结经验，他们将原来的提法改为草灌乔一齐上，以草灌为主。从形式上看仅是几个字的颠倒，但沙区绿化的步子却因此大大加快了。这反映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接近于实际，自然界也因此慷慨地奖赏了他们。

被日本人尊为“沙丘之父”的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有一句名言：“21世纪是沙漠的时代。”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于他对沙漠的热爱和信心。他一贯认为，进军沙漠不仅是投入治理，还会有可观的效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近年来，榆林市在治沙整体思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不再只着眼于“治害”，同时也着眼于“致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将沙漠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推动治沙工作向深层次、高质量发展。为此，他们在狠抓基本农田、基地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结构调整。一个是林种、树种、草种结构的调整。重点建设以樟子松

稀疏林为主的混交防护林，初步形成以防护林为主干，用材林、经济林和优质灌丛草原为两翼的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另一个是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扩大水稻、春小麦种植面积，发展油料、烤烟等经济作物，发展蔬菜地膜栽培。同时大力发展养殖业，发展粮油加工、林副产品加工、商贸服务等乡镇企业。多渠道加大投入，加快沙区产业综合开发的步伐。

思路的开阔带来了明显的效益。2000年，榆林沙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8.4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74%。事实说明，榆林的潜力在沙，希望也在沙。

政策调动千军万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榆林在治沙造林上主要是以国营造林和集体造林为主，执行的是“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在房前后植树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由于在政策上把个体劳动者生产经营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集体生产和经营又在收益分配上吃“大锅饭”，所以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治沙造林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榆林地区解放思想，冲破了一个个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沙漠治理政策上不断有所调整。

1979年，试探性地给每户划拨3~5亩荒沙地进行治理。两年后即有所突破，允许在有条件的地方，给每户社员划拨一定面积的荒山荒沙植树造林，谁治归谁，允许继承。

1985年又前进了一步。允许个体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山荒沙，并可以雇请帮工。时隔三年，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出台了拍卖荒沙、荒滩使用权和在风沙草滩区大力发展民办水利的决定。规定除群众个体、联户承包治理外，科技人员及其他干部也可以带职带薪下去，可以辞职、调离、停薪留职承包、领办、承租国

代初，榆林开始沙漠治理时，苏联专家提出搞“迎风板”挡沙。这种办法一是对大的风沙作用不大，二是用木板成本太高，难以大面积应用。而沙区群众创造的在流动沙丘迎风坡采用沙蒿、紫穗槐、稻麦草或沙生植物秸秆设置障蔽的做法，不仅固沙积沙效果好，而且所用材料价廉普通，便于推广。这一做法，经过科技人员的总结丰富，又派生出卧式沙障、草绳沙障、半荫蔽式沙障等多种，进一步提高了其使用效果。

说到科技人员的功绩，我们不能不提飞播造林。1965年前，榆林共搞了5次飞播，由于植物种子选用不当，播下的107万亩沙蒿，绝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为了解决飞播造林中的技术难题，治沙研究所

营林场、乡镇林场和沙区开发项目。

两次全国治沙工作会议之后,又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鼓励区内外单位、个人,特别是鼓励引导机关干部和下岗职工创办绿色企业,参与荒山荒沙治理开发。荒沙地使用权允许继承、转让;治理开发的收益五年内不征购、不提留、不摊派;优先供应种苗和其他生产资料;发放治沙的扶贫贷款等。按权属划定由国营林场和所属乡村承包的荒沙,可以实行跨县、跨乡、跨村承包治理或兴办开发性项目;外地区来榆林承包治沙或兴办林牧场的,在受益前实行免税,并在贷款、投资上给予优惠。

政策的开放搞活,使蕴藏在干部群众中的治沙积极性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短时间内,全市已有12.7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400多万亩;千亩万亩以上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竞相涌现。机关干部、下岗职工、城镇居民到农村承包治沙、兴办产业渐成时尚。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刘晓峰,1997年退休后,和神木县乔岔滩高仁里峁农民一起筹措资金,承包荒沙5000多亩,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优质速生杨基地。2000年仅卖苗木一项收入860万元。一批干部因为治沙有功受到奖励。仅榆阳区就有6位乡(镇)领导、3位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提升了一级工资,53位乡(镇)领导受到物质奖励。榆林市上上下下,真正形成了家家户户参与,级级干部关心的局面。

牛玉琴、石光银都是这一时期涌现的治沙承包大户。牛玉琴和丈夫承包了村上的万亩荒沙,石光银联合127户农户成立荒沙治理开发公司,承包了国有林场的6万多亩荒沙治理。因其治沙中的突出成绩,牛玉琴进入全国十大女杰行列,石光银应邀走上了在印度召开的亚非全球非政府组织南南与南北合作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论坛。他们

的事迹早已声名远播,无须重复。我们这里介绍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郭成旺。

郭成旺是靖边县毛团村人。1984年冬,靖边县农村“五荒地”大承包的热潮乍起,此年已64岁的郭成旺老汉,兴奋得几夜没有合眼,他和两个儿子商量,要把离家10公里外的荒沙地承包下来种树种草。儿子们都赞成。于是他又找了女婿、侄女婿、侄孙子等14户亲戚,联户承包1万亩流动沙丘的绿化治理。

消息一传开,在毛团村一下子炸了锅。有人说郭成旺是“老二杆子”,有人说他“想出风头,不看年纪”。老伴也不同意他承这个头,说:“你已经64了,还能活几年?等树长大了,你早见阎王了。”郭成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享受不上不要紧,但治了荒沙,就给后人栽下了百年用不完的摇钱树。”

1985年一开春,他率先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1200元,其他14户也集资4000元。为了买到好树苗,他跑遍全县8个林场,买下7万余株树苗,开始了治理荒沙的战斗。每天天不亮,他便领着14户的所有劳力,赶上毛驴,带上干粮,驴驮人背树苗草籽,步行10公里路到承包的荒沙地栽树种草。

这样干了两年,他们又承包了几万亩荒沙。为了方便,郭成旺领着儿子在荒沙滩里搭起了一个沙柳棚子。每天植树时,20多个人吃住在沙柳棚里。1989年,他又卖猪卖羊加上贷款,筹够6000多元,在林区修了4间砖木结构房子,打了

19米深的一口水井,把家搬在林区住下。十余个春秋过去,造林45000亩,昔日光溜溜的沙丘,开始披上了绿装。郭成旺也因此被省上授予造林先进个人的称号。我们到毛团村时,只见到郭成旺的一个儿子。儿子说,等他的儿子长大了,也要教他像爷爷那样造林种草,这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不信降不住沙漠!

在榆阳区金鸡滩乡的柳卜滩,我们参观了初具规模的大漠农业有限公司。这是由米脂县农民高振东投资200余万元搞起来的。因为有了沙荒拍卖政策,他购置了这里的202亩荒沙地,修建无支柱蔬菜大棚126个,引资购置以色列节水滴灌系统装置一套,修建深水泵井两口。现已形成以反季节及常规蔬菜为主体的高科技农业生产基地雏形。生产高峰期,日产各类鲜菜近万斤,成为榆林市蔬菜供应第一大户。仅蔬菜一项,年产值即达400万元以上。

我们的文章写完了,但榆林的治沙却没有完。

榆林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实现的这一切,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治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已经营建起来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进入良性循环还遥遥无期。如果不加注意,沙进人退的历史还会卷土重来。

榆林的同志是清醒的。

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曾对“泉涸,鱼相与处于陆”发过这样一种感慨:“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可惜传统的道德文化只钟情歌颂“相濡以沫”,而将“相忘于江湖”的大境界忽略了。泉干涸了,相濡以沫固然感人,但毕竟不妙。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使江清水碧,鱼儿相忘于江湖呢?

但愿人类在防治土地荒漠化的问题上,能够走在大灾难的前面。■